

宝庆讲寺丛书

中国佛教学者文集

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 主编

《成唯识论》识变问题研究

张利文 著



宗

宝庆讲寺丛书

中国佛教学者文集

主编 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
副主编 圣凯 道坚 黄夏年



《成唯识论》
识变问题研究

张利文 著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成唯识论》识变问题研究/张利文著. -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13.9
(宝庆讲寺丛书.中国佛教学者文集/朗宇法师、清修法师主编)
ISBN 978-7-80254-748-3

I. ①成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唯识宗-研究 IV. ①B946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22098号

《成唯识论》识变问题研究

张利文 著

出版发行: 宗教文化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(100009)

电 话: 64095215(发行部) 64095201(编辑部)

策划组稿: 黄夏年

责任编辑: 杨登保

版式设计: 高秋兰

印 刷: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版本记录: 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8.5印张 200千字

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54-748-3

定 价: 32.00元

总 序

从佛法本身来说,教、理、行、证的修学次第,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。但是,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、喜好的不同,往往有所偏向,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,有重义理、重实践等区别。作为佛弟子来说,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,充分、完整地表达出来,如“阿毗达摩”虽然着重于论证“法”的自性、定义、关系等,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“谛理的现观”,最终归于修证。那么,重修证的佛教,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,重视佛法的适应性、实效性,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,如初期大乘经典以“般若”、“三昧”、“解脱门”、“陀罗尼”、“菩提心”等作为中心,来表达从发趣、修行到证入的历程。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,但都是佛法的根本,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。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,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,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。《高僧传》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,其中翻译、解义、读诵便属于义解门;而习禅、明律、感通、遗身、护法、兴福,都是属于实践门;最后一科“杂科”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,旁及世间经书、治世语言、礼乐文章

等,无不兼通。

但是,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,主要是注疏经、律、论,在“述而不作”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,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。而且,这些佛教义解僧,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,通过注疏、论著,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。南北朝佛教的兴盛、隋唐佛教的辉煌,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。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,重视主体的体认、自己身心的解脱;净土法门的流行,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,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。但是,我们也应该看到,随着禅、净的流行,在这种“简单”、“不立文字”的潮流下,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、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。于是,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。

另一方面,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。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,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,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,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。于是,通过接触梵文、巴利文等东方语言,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,消化佛教的教义。在“理性主义”、“科学主义”思想的影响下,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观性、纯学术性,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,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——佛学。19世纪后期,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,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。随着“西学东渐”、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,中国开始有了近

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,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,如《大乘起信论》、《楞严经》的辨伪,“大乘佛教非佛说”的讨论,“佛教非宗教非哲学”之辩等。同时,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,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“人生佛教”运动,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,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。但是,相对来说,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,像吕澂、陈垣、汤用彤等,皆为一代学术大师。

改革开放后,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,经过二十年的努力,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、重塑佛像的工作,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、香火旺盛的现象。于是,培养人才、弘法、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。然而,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,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。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,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。

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,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,文献学、考据学、思想史、语言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,对佛教进行理性的分析,定性定量,促使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。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,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,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,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。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,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,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,显示其优胜之处。通过学术研究,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,提高了

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。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,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,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;同时,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,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,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,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。

因此,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,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,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、文物中,去伪存真,去粗取精,探索其前后延续,彼此关联的因果性;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,及其因时、因地的适应。以了解过去、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,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,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“人间佛教”思想,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“以文化阐扬佛法,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、本土化、现代化的权巧方便”。现代中国佛教界,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,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,通过转化与变通,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中去,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。

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(989),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。嘉定十五年(1222)宋宁宗赐名“宝庆讲寺”。寺里的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、尊重学术、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,一直讲法不辍。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,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《三字经》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《宝庆讲寺

记》；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《宝庆寺观音殿记》。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，高高地耸立在寺里。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，在日常事务、早晚功课、坐禅念佛等之外，勤于读书，研究经论。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，参访名山大寺，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，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。因此无论到哪里，我都会带上一些书，也经常会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，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，蔚为大观，感到欣慰。但是，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，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，而且现有书籍之中，难免良莠不齐，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。有感于此，我和道坚法师、圣凯法师、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，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。于是，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，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，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，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。

朗 宇

2004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

序 一

《成唯识论》是一部编译注释《唯识三十颂》的著作，而《唯识三十颂》是世亲晚年之作，概论“一切唯识”的要义，瑜伽行派学者曾为之纷纷作注，其中重要的注释有十家。十家注释各有所长，玄奘在印度时已全部搜集，设想回国后一并译出，但后来他采纳弟子窥基意见，改以护法观点为主，糅合其他九家学说于一书，集成《成唯识论》，并由窥基充任笔受。所以，该书与其说是翻释，倒不如说是著述；与其说是十家之说，倒不如说是玄奘一家之学。

玄奘是一位杰出的佛教哲学家，他卓越的学术活动提高了传统哲学思想的层次；他所创立的唯识宗，善于概念、范畴的阐述和辨析，体系完整、结构严密，在隋唐佛教宗派中首屈一指。玄奘的译著和编著，与同时代多数佛教学者大异其趣，主要表现在他对原典的充分尊重，以严肃、客观的态度表述原典思想，忠实于唯识学的本来面貌。玄奘的译经成就，是对真理追求者的回报；玄奘的学术造诣，凝聚了学者的良知，体现了学术的精神，反映了治学的态度。

虽然就表象上看，玄奘所创的唯识宗在唐代佛教史上

影响有限,但是我们必须承认,不仅唐代佛教的繁荣昌盛与玄奘个人的历史性贡献相联系,而且唐代佛教思想的展开和深化也与玄奘的个人努力有密切关系。总体上说,唐代佛教宗派及其思想的繁荣有其必然的原因,即从属于该时代的士族贵族的政治经济、社会文化环境。唐王朝统一以后,士族贵族及其思想文化仍然保持主流地位,虽然氏族志一再重修,科举取士制也开始实施,统治者试图由此而削弱士族势力,但是在安史之乱之前,士族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主流地位未曾动摇。佛教思想受惠于两晋南北朝的士族经济文化,从而获得历史性的长足发展,现在又因士族贵族文化稳定的主流地位,确保了它在唐代前期思想界的繁荣局面。

任何时代的学术繁荣不能没有作为该时代标志性的大师,而没有大师的时代必然是学术荒芜的时代。正是在士族文化背景的基础上,玄奘担负起了一代学术大师的重任;有赖于他的深邃学养和人格魅力,佛教宗派思想的发展获得更为有力的支持。在玄奘同时代或前后,还出现了罗什、僧叡、僧肇、道生、智顓、吉藏、窥基、法藏、澄观、湛然、宗密等大批优秀佛教学者,他们在丰富和发展传统哲学思想方面贡献巨大,有的甚至可以视为世界一流的哲学家或思想家,他们提出并阐述的许多概念、范畴、命题,极大地丰富了古代哲学思想的宝库,代表着他们所处时代学术文化的高峰。这些佛教学者在构建哲学体系方面也作出过重大贡献,如在僧肇的《肇论》,智顓的《摩诃止观》、

《法华玄义》，吉藏的《中观论疏》、《大乘玄论》，玄奘的《成唯识论》，窥基的《大乘法苑义林章》、《成唯识论述记》，法藏的《华严经探玄记》、《大乘起信论义记》，澄观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疏》，宗密的《圆觉经大疏钞》等论著中，都已完整地表达了各自的哲学构思。

玄奘法师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巨人，他的学养和人格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精神生活；对于不懈追求精神进取的人来说，他就是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。所以，对玄奘著述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，在很长一个阶段内仍将是我们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瑜伽行派认为，人们能否获得解脱，关键就在对整个宇宙人生的认识。他们不同意中观学派“一切皆空”的说法，认为那样会使人们的思想产生混乱，乃至否定佛性的真实性、成佛的可能性。所以他们不从“无自性”角度讲缘起，而从“唯识性”角度讲缘起，把缘起归结为“识”的作用、“识”的分别。按瑜伽行派所说，阿赖耶识是宇宙的全部、万有的根源，它含藏着能够变现万物的“种子”，所以阿赖耶识又名“藏识”，它含藏、保存一切种子，由这一切种子缘起宇宙万物。因为“万法唯识”强调万法由“识”所变，所以瑜伽行派又主张“识有境无”或“唯识无境”。唯识学否定外境实有的同时，肯定了“识”的真实性。所谓“有宗”的“有”，就是指“识有”。在瑜伽行派看来，世界万物只是阿赖耶识中种子变现的产物，是人的心识自我呈现出来的表象（影像）。所以只有“识”才是唯一的真实。

识不仅是现实一切事物的最终根源,而且也是瑜伽行派宗教实践的主要依据。瑜伽行派认为,大乘佛教的修行应从根本上做起,即从转变阿赖耶识的性质着手,乃提出“转识成智”说。“转识成智”也就是所谓“转八识以成四智”,意即通过修行转舍恶业,增长善业,将世人的迷惑状态导向觉悟境界。实际上,这也就是要求人们破除世俗的一切观念,确信大乘佛教的教义,从而完成向佛的境界的过渡。四智,即四种智慧,其中最高智慧名“大圆镜智”,也就是佛的智慧。

瑜伽行派在印度流传中,形成了唯识古学和唯识今学两个系统。唯识古学代表人物有难陀和安慧;唯识今学代表人物有护月、陈那、护法等。陈那善于用因明(佛教逻辑)方式阐述瑜伽行派学说;护法是陈那弟子,也传习因明之学。虽然早在玄奘把唯识今学传入中国的时候,唯识古、今之学的义理之争在他的译场中已经展开,并且一直延续至中唐,演变为天台学者对玄奘所传唯识学的论争,但当时唯识学者对唯识古、今之学差异的理解尚未达到自觉,更不可能进入近代学术研究的视域,他们更多的是把唯识古、今之学的差异解释为译师的误译或印度佛经的不了义。自金陵刻经处开创以近代学术方法研究佛学以来,唯识学在唐末消沉之后再度兴起,吕澂、印顺、霍韬晦等学者逐渐认识到新、旧译唯识学者之间的争议主要源自译师的师承不同,而且印度瑜伽师的思想传承中本身就存在着分歧。吕澂据此提出唯识学古、今学派的分判,并以此关

涉中国唯识学旧译与新译的不同^①；印顺则进一步提出“唯识学是在发展中完成的”这样一种唯识理念^②。

然而在此后的相当长时期内，唯识学的差异性研究并未出现足以称道的成果。吕澂虽然最早提出唯识古、今学的划分标准，然而过于简略和笼统，也存在一些问题，例如无法解释世亲早、晚期作品间的差异。印顺虽然阐明了唯识学是瑜伽诸师师承过程中逐步完善、不断演变的学说，也认同唯识学在大致上可以有“古义”与“新义”两种不同，但它们的不同点究竟在哪里，则没有专门就此展开辨析。因此对于唯识古、今之学的划分，以及唯识诸论发展的演变轨迹，学界至今仍然缺乏一个清晰的定义或阐述。可喜的是，近年来唯识学研究又有新的进展，部分学者开始重新关注这个问题，并作出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，这有可能使学界对于唯识古、今之学的划分，以及唯识诸论的演变轨迹的认识方面逐渐清晰起来。

瑜伽行派的学说思想在南北朝时由菩提流支、勒那摩提等人传入中原地区，在北方形成地论学派；真谛三藏则在南方地区传授瑜伽行派，在江南一带形成摄论学派。玄奘回国后传授护法一系唯识学，虽说瑜伽行派所依经典可归纳为“六经十一论”，实际上学者们重视的主要是《解深密经》和《瑜伽师地论》，理论体系集中表现在《成唯识论》中。

① 见《庄严经论与唯识古学》，《吕澂佛学论著选集》卷一。

② 见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。

唯识学特别注意概念分析(如把一切现象分析为五位百法,极其细微而烦琐),将佛教唯心论推衍到极致。其理论体系庞大完整,论证方式烦琐复杂,在世界宗教史上也属罕见,是典型的中世纪经院哲学。玄奘、窥基对大乘瑜伽行派的研究和阐述,虽也有局部的个人创见,但基本上是对唯识今学的严格继承和反复论证。这样做的结果,一方面使原本十分烦琐的理论更为艰涩,另一方面也使原本相当精密的体系更为严谨。由于上述显而易见的原因,即使在佛学气氛甚为浓重的唐代,这个理论体系也很难为一般人接受,它的影响局限于教界上层知识人士。

但是,一种学术思想或一个理论体系的价值,往往不以它的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为主要依据。玄奘所创唯识宗在哲学思想史上的意义,就在于它无意接受固有思维方式和思想原则的规范,拒绝参与传统文化对印度佛学的改造,相反以鲜明的个性表达研究对象的真实思想。唯识宗的学术个性,表现在它寻求瑜伽行派学说真相的求实精神,对学术理想持之以恒的不懈追求。为此,即使如皇权代表李世民之辈,也曾表达过对玄奘求真精神的感佩,他在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中写道:“凝心内境,悲正法之凌迟;栖虑玄门,慨深文之讹谬。思欲分条析理,广彼前闻;截伪续真,开兹后学。是以翘心净土,往游西域;乘危远迈,杖策孤征。……诚重劳轻,求深愿达。周游西宇,十有七年,

穷历道邦,询求正教。”^①玄奘的“杖策孤征”,是鉴于“正法之凌迟”、“深文之讹谬”,为了“分条析理”、“截伪续真”、“询求正教”,他不惜“万里山川”、“百重寒暑”。与这种求真精神相联系的,是玄奘极为可贵的人格魅力。

唯识宗所阐述的大乘瑜伽行派思想,相当于从唯识性角度详细分析、研究人的精神现象即先验意识,通过本质的直觉而认识意识的基本结构。唯识学者从自我意识出发,将外部世界统摄于意识,即以识为核心,视一切现象为识的变现,在此基础上确立“万法唯识”、“唯识无境”命题,构建起十分彻底的唯心论体系。唯识学者对现象的分析虽然存在先天的缺陷,但是就概念分析的细致入微而言,具有高度的理论思维价值。在唯识学者看来,经验的现象世界只是识的表象,它的本质是先验意识本身。也就是说,一切现象仅仅是意识的自我显现;现象既是意识显现场所,又是意识显现过程,还是意识显现对象,它们都是在意识活动中发生的。因此,唯识学对万法唯识的研究,就在于通过意识的自我显现而揭示事物本身,以表达对世界最高真实、人生最终目的的认识。

唯识宗的学术兴趣及其治学道路有其原则立场,不与传统经世致用观念相一致;它所采用的概念思维、逻辑推论的思想方法,也与流俗之学相区别,这些都是使它无法取得“中国化”、“民族化”效果的原因。在一个普遍关注

^① 《续高僧传》卷四《玄奘传》,《大正藏》卷50。

现实需求的民族文化环境中,玄奘及其弟子的学术倾向颇为不合时宜。陈寅恪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》云:“释迦之教义,无父无君,与吾国传统之学说,存在之制度,无一不相冲突。输入之后,若久不变易,则决难保持。是以佛教学说,能于吾国思想史上,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,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。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,若玄奘唯识之学,虽震动一时之人心,而卒归于消沉歇绝。”^①唯识学缘于无意“吸收改造”,而取“忠实输入”态度,终归于“消沉歇绝”,其中蕴含着思维方式和学术原则等深层背景。陈寅恪所说是一个客观历史事实,但对这个事实可以允许不同角度的解读。

学术研究与文化环境的结合,固然可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答案,并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,但是也将使学术满足于形而下思考,蜕变为工匠式的雕虫小技。倘若我们对所要研究的对象知之甚少或本意不明,乃至为了满足“治术”之需而对相关文献恣意误读,必然会偏离学术的基本立场。唯识学者的治学态度及其方法弥补了此前佛学传统的某些缺憾,以人们普遍缺乏兴趣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推论为起点,为民族学术史乃至文化史留下了一笔极其丰硕、弥足珍贵的遗产。基于世人的认识局限,历史人物常以成败而论,沦为权力话语的工具,学术研究切不可如此轻率,简单的好恶辨别对学术而言是极不适宜的。

^① 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。

在传统学术史上,唯识学虽然未能跻身显学之列,但是它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思想资料,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研究,能使我们从中窥见昔日唯识学讨论的基本概念、命题。从唯识学者的理论兴趣中,可以看到当年文化精英的精神执著和思维水平。不同理论形态的交流、不同思维方式的对话,对于一个民族的健康成长具有深远意义。唯识学迅速衰落的命运,不应该是民族文化发展进步的福音。如唯识宗那样,既然一种纯粹理论的学术探讨形式和复杂烦琐的逻辑推论不受崇尚,那么与此相类似的以理论思维和概念分析为兴趣的其他佛教宗派,也终究要接受同样历史命运的安排。唯识学在经历了清末部分知识分子复兴要求之后,当前学界又出现不绝如缕的研究成果,这充分表明我们民族并不缺乏理论思维和概念分析能力;唯识学所表达的类似存在论和实证论的哲学思考,在经历长期沉寂后响起了强烈的回音,在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找到了共同的逻辑基础,这看似偶然其实绝非偶然,应该视为一种历史性进步。

近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唯识学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,但还远未达到充分和令人满意的程度。有关古、今两种唯识学说体系的差异,至今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,现有成果中也难免存在一些套用唯识古学义理解说《成唯识论》的缺憾,对《成唯识论》中许多独有的概念或问题少见或未见有深入的辨析,一些观点或是龃龉的,或是误解的。概念的不清晰、问题讨论的缺失,唯识今学体系内在理路的